



ZHONGGUO
ZANGDI KAOGU



中国藏地考古

—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天地出版社



ZHONGGUO
ZANGDI KAOGU



中国藏地考古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藏地考古: 全10册 /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55-1019-5

I. ①中… II. ①四… ②四… III. ①考古调查—西藏 IV. ①K8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63689号



中国藏地考古

ZHONGGUO ZANGDI KAOGU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出品人 罗文琦

策划组稿 范 勇 罗文琦
责任编辑 范 勇 梁 凌 谭清洁
英文审订 张兵一
责任校对 程 于 张思秋 罗 娴 王 荻
封面设计 经典记忆 邹小工 李 敏
电脑制作 跨 克
责任印制 桑 蓉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四川经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
成品尺寸 230mm×300mm 1/8
印 张 450
字 数 6000千
定 价 6800.00元 (全十册)
书 号 ISBN 978-7-5455-1019-5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87734639(总编室) 87735359(营销部)
87734601(市场部) 87734632(综合业务部)
购书咨询热线: (028)87734632 87738671

编委会

主 编：霍 巍

副主编（排名不分先后）：

李永宪 王仁湘 张建林 任晓燕 许新国 汤惠生 罗 丰
王 辉 范 勇

编 委（排名不分先后）：

刘世忠 哈比布 仝 涛 乔 虹 张长虹 吕红亮 杨清凡
杨 锋 张延清（华清道尔吉） 马 轩

Editor-in-Chief: Huo Wei

Deputy Editors-in-Chief (in random order):

Li Yongxian Wang Renxiang Zhang Jianlin Ren Xiaoyan
Xu Xinguo Tang Huisheng Luo Feng Wang Hui Fan Yong

Contributing Editors (in random order):

Liu Shizhong Ha Bibu Tong Tao Qiao Hong Zhang Changhong
Lyu Hongliang Yang Qingfan Yang Feng Zhang Yanqing Ma Xuan

出版说明

“藏地”是一个约略的地域用语表述，它表达的地域概念与“藏区”既有相似处，又有不同：它不是行政区划，不像“藏区”概念那样清晰；它是指西藏与涉藏地区（现在的藏区，以及历史上藏族曾经居住、生活或活动的地域），也包括藏族文化发展、传播的区域而言。因此它是一个宽泛的、边界并不明晰的概念，如同我国已有的“江淮”、“湖湘”等地域用语一样，是地域的概指。

“藏地”区域内的文化内涵与藏文化有密切关联，可以说藏地是藏文化发生发展之地；但该地域文化并非等同于藏文化，更非完全等同于藏传佛教文化。其文化内涵较藏文化要丰富和广泛，因为在“藏地”，有着人类远古的文化、史前文化和历史文化；历史上的藏地，是多民族共居和相互交融、发展的地域。

历史上的藏地，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土著文明、藏羌文明，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重要支系，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藏地考古，是兼有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而言。其研究范围，包括国内西藏地区的古代遗迹、遗存、遗物，相关涉藏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址、遗存、遗物，以及流散海内外各地的涉藏文物；还有西藏周邻藏传佛教传播流行地区的文化遗存。

近年来，中国藏地考古取得了不少的重要成果，从而使得编撰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反映藏地考古的相关文献以及研究文集的大型图书成为可能。

本书就是这样一部大型藏地考古图书，系藏地考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是自20世纪50年代迄今的集大成的学术文集。所收入的发掘报告、田野调查、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文物志书、历史文献等，种类多、内容丰富庞杂，所涉时段近半个世纪，出自众多考古单位、个人之手，而且著作、论文体例不一、图表格格式不一，注释、参考文献也不统一等；加之本书语言种类繁多，涉及众多学术专用术语，疑难颇多，不相统一处颇多，因此，本书的出版，具有整理和



编辑的双重任务。

中国考古学横跨人文和科技两大领域，长时期归属于历史学范畴，其论文与通常的科技论文有所不同，不仅传承了许多学术传统和历史规范，还有许多约定俗成延续至今的惯例。

为使本书成为一部内容丰富、格式体例较为规范的考古文集，对本书的编辑工作和技术处理，一方面，尊重约定俗成的惯例，对文章的引文、注释、译名均按照通常的考古学文集的体例要求进行；另一方面，兼顾国际学术论文和科技学术论文的规范等要求，并结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图书出版管理司、中国标准出版社编《作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第三版）的要求，对书中的图、译注、文献参考书目以及引用序号、图文分类等，都作了相应的、合适的处理。

书中的外文，由于地名、人名、宗教用语等，大多来自藏语、梵语、汉语的音译，而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拉丁语文章中也存在许多转译、对译的情况，因此，中外文中一物异名和一物多名的现象较为常见；加上一些国外学者研究所处时代的用语差异，各语种对学术用语的不规范、不相对应的现象也比较多见。对此，本书决定采用一般通行的方式处理，既对外文名词和术语作相对规范，同时兼顾知识点的需求，适当允许文章个别地方外语一物异名的情况存在。

《中国藏地考古》一书，坚持严谨、求真、科学的学术立场。为保持本书所具有的学术性，除国内长期从事西藏考古的著名学者霍巍教授担纲主编，还由诸多在藏地考古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担任副主编。

本书的编撰出版，不仅为今后的藏地考古工作和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而且为海内外藏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新的文献资料。我们衷心希望，经过悉心整理和编辑后出版的这部大型学术类图书，既能填补学术出版空白，又能在学术上具有自己的独特地位。

《中国藏地考古》编纂委员会

2013年10月1日

凡 例

《中国藏地考古》系收集中国藏地考古研究成果的大型学术专书，由《中国藏地考古》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主要编者，天地出版社则承担编纂和整理的具体工作。

本书所收藏地考古科研成果形式含报告、著作和论文等大类，分为田野工作、艺术考古、综合研究三编。主要包括田野调查和考古资料（考古发掘报告、简报，田野调查报告等），艺术考古资料和研究，综合考古研究、考古文物专题研究等。

本书每一编根据内容成册，一般三册，最多可分四册。

本书“田野工作编”分为三册（第一、二、三册），按历史时代划分，共分为三个时期阶段，即史前和前吐蕃时期、吐蕃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内容涵括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遗迹、遗物的田野调查，古代岩画、石刻、题记，摩崖刻画，寺庙建筑，寺庙遗存遗物，藏王陵寝，古王国遗址等诸多方面。

本书“田野工作编”的考古发掘报告、简报，调查报告基本依据年代顺序，参考地域进行编排。

本书“艺术考古编”分为四册（第四、五、六、七册），其编排顺序大体依据年代，内容主要按艺术类型来考虑：第四册为西藏的岩画、石刻、摩崖造像；第五册为西藏绘画和造型艺术（涵括彩绘图案、唐卡，佛像、金银器、木雕、牙雕、擦擦、绢画等宗教用物等）；第六册为西藏壁画艺术；第七册为西藏西部与环喜马拉雅地区佛教艺术。

该编所收，既有资料文献类图书，又有研究专著和专题研究论文，部分内容为中英文对照。是编注重资料性、文献性和艺术性，同时也收录海外学者在西藏艺术考古方面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学术论文。

本书“综合研究编”分为三册（第八、九、十册）。第八册为研究综述，收录有关西藏考古的学术论文，以宏观课题研究为主；第九册为考古分论，以西藏考古微观课题研究为主；第十册为专题研究，以吐蕃考古研究为主。



是编收录学术论文的基本标准是,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发覆纠谬,征实考信。着重收录在西藏考古领域中注重研究方法创新、具有研究深度及开阔的学术视野的学术论文。学术论文编的编排顺序,主要以类编排,辅以年代,大体按照所论述考古文物的年代早晚进行编排。

本书收录论文的篇幅遵循国际通例,不强求长短划一。研究成果分类入目。

国内学者论文,不保留中文提要,如有英文提要,一般均保留。凡论文非汉语(如英、法、德、日等语种)者,收入本书时,论文正文一般翻译成中文,注释和参考文献均保留外文,或中文与外文对照;有个别国内外学者的论文用外文发表。

论文既有附记又有参考文献、英文提要的,其排列顺序是:正文之后为附记,再其次是参考文献(部分论文没有),最后是英文提要。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在论文标题下一般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国外作者则尽可能注明国籍和其工作单位。

本书的注释,按照国内社会科学著作以及考古学著作的惯例进行;文内均采用页注,不使用篇末注。部分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学术论文,按照参会学术要求注释的,一律保留原样,只在图文分类上稍作改动,按最新规定处理。

本书所涉及的大地名,如西藏的地区、县、市名,一律以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地图册》(2012年)现行地名为主,对较早使用的藏译地名或过去的旧地名,如需规范,应在括号中补充说明。考古发掘、调查中的小地名,如现行地图地名无对照,可保持原样。至于遗址地名,一律保持原样,不予改动。对于使用已久的地名称呼,如雅鲁藏布江,不作“雅鲁藏布”规范处理。

本书所使用的图版、线描图,均依照原图;少数不清晰者,适当做优化处理或者重新绘制。

本书为便于图版编排,基于排版和文图对应的需求,在不影响读者阅读使用的前提下,少量文章的图版有适当调整,故未严格按照图序来排列。

本书页码统一编排,全书通码。总目录按通码标明,分册目录也按通码页码标明。

本书的编委会成员,分列中文、英文。

本书前言分列中文、英文。

本书部分注释,为便于读者使用和查阅,其引用文献,分列中文、英文或其他语种文字。

前言

霍巍

中国藏地考古，是以青藏高原为重点和中心开展的考古学工作，自然也包括了其他藏族地区的考古学工作。本编主要收录与今天中国行政区划中的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相关考古资料与论述。

近年来，许多考古学者在谈到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史时，都曾引用傅斯年先生当年的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鼓励学者要不断扩充研究史料，尤其是地下出土资料的发掘与利用。这和王国维先生提倡学术研究要重视文献与考古材料并用的“二重证据法”几乎同时成为当时引领学术发展的两大“引擎”，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的发展，还拓展了诸如敦煌学、简牍学等研究领域，影响至为深远。

其实，这两位民国时期的学术领军人物当时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由于敦煌文书、居延汉简等西域考古的重大发现，西方学术界利用这些资料对西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已处于领先水平，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学者的爱国精神和奋起直追的高度热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也有了更为深刻的反省和认识。傅斯年先生这句名言的出处是在他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当中，在讲这句话的前面，他还有很长的一段话比较了当时中西学术发展出现的差距，并且指出了学术发展的三项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能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能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的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但他们却有些地方比我们范



围来得宽些。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君之译外国传、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之注《马可波罗游记》、米勒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办到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找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¹。

他这里所强调的材料的扩充、方法的进步，尤其举出研究中国“四裔问题”上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与所获成绩的例子，实际上都暗含着两层意思：一是重视除文献材料之外地下考古材料的出土，二是主张将研究空间从传统的中原地区向着边疆地区（亦即旧籍中的“四裔”）拓展，认为这将是学术未来发展的方向。

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近一百年间，中国学术的发展轨迹实际上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迈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历史，尤其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先秦史）和文献记载极为简略的边疆史。

与中原周边各民族和各地区相比较，藏地历史和考古学的研究相对较为滞后。传统的藏地历史研究主要依据汉文和藏文的文献，但在吐蕃王朝以前，藏地并没有成熟的文字和历史文献记载，吐蕃王朝以前的历史均缺乏可靠的历史年表。既使在学术界公认的7至8世纪吐蕃王朝创立藏文字之后，保存至今的真正属于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记载也相当贫乏，除敦煌出土的吐蕃历史文书、新疆及青海等地发现的一些藏文简牍和西藏本土现存的部分金石铭刻之外，传世的藏文历史著作成书年代多在14世纪之后，在更多的情况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还得依靠为数不丰的唐宋以后逐渐形成的汉文文献资料。

和中国西域考古一样，西藏高原的考古学研究史，同样可以上溯到西方学者对这一地区的探险与考察活动。欧洲人最早进入西藏高原的记载，为1325年波特隆的弗莱尔·奥德里克以天主教传教士的身份来到西藏，目的在于寻东方“基督的圣地”。在此之后，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之间，又有几批欧洲天主教教

1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民国十七年十月。

士越过喜马拉雅山麓，或者通过中国内地进入西藏，他们在阿里和卫藏等地进行长期的传教活动，同时也作过一些有关西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的调查。从后来他们在外国所公布的零星材料来看，当中已经开始注意到对西藏古物的考察与研究¹。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方学者研究汉学以及佛教、东方历史与语言形成一种国际风气，与“敦煌学”的兴起几乎同时，“西藏学”的研究也开始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一部分受过人类学与考古学训练的西方学者也开始了西藏地区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前。

毋庸讳言，西方学者在西藏进行的工作，都怀有着他们各自的目的，带有当时特有的“殖民文化”色彩。其中一部分人甚至直接是为着西方国家向西藏的侵略与渗透而服务的。但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他们是最早的开启者。这当中，最为著名的代表者是意大利藏学家朱佩塞·杜齐（Giuseppe Tucci）。这位1984年逝世的学者在他的一生之中，为我们留下大量有关西藏考古的论著，其中的《西藏考古》、《印度—西藏》等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²。在《西藏考古》一书中，便有“史前时代”、“藏王墓”等涉及西藏不同时期考古的章节。1948年，杜齐还最早开始对吐蕃藏王陵墓进行实地调查，并于两年后发表专著《吐蕃赞普陵考》，记述了位于今山南琼结县内历代吐蕃赞普陵墓的形制、布局、碑刻铭文等情况³。此外，杜齐对吐蕃金石铭刻材料也作过一些研究（详见另文）。除西藏本土之外，杜齐还主持了对在尼泊尔的藏人遗址以及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Swat Valley）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佛教梵文文献等文物⁴。这些工作对于当时的西藏田野考古工作而言，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1 Barbara Lipton.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Tibet, 1327-1950*. Vol. 24. No. 2~3, The Museum New Series. Newark: The Newark Museum Association, 1972.

2 G. 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此书原名“《穿越喜马拉雅》”（*Transhimalaya*）为法国大学考古系教授马尔加第主编的考古学丛书“古代文明丛书”中的一册。近年来有杜齐著，魏正中、萨尔吉等译《梵天佛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亚欧丛书），是将杜齐的几部有关西藏的著作校译汇编而成。

3 G. Tucci.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e, 1950. 此书中译本有阿沛·晋美译文《藏王墓考》，刊于《藏族研究译文集》第1辑，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1983年。

4 其中部分资料已经公布于《关于两次尼泊尔科学考察报告》（G. Tucci. *Preliminary Report on Two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Nepal*. Rome, 1956）。

也可视为藏地考古的开端。

与杜齐大约先后在西藏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还有1925年至1928年由俄籍瑞典人劳瑞茨（G. N. Roerich，又译为罗列赫）所率领的中亚考古队在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进行的考古调查。他们在藏北发掘了一批出土有青铜箭镞的石丘墓以及与之相关的大石遗迹，并首次将这些大石遗迹按照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分为独石（menhirs）、石圈（cromlechs）和列石（alinements）几种不同的类型加以考察¹。20世纪上半叶国外学者进行的吐蕃考古，还有英国人黎吉生（H. E. Richadson）对藏王陵墓的实地调查²，意大利人P. 奥夫斯莱特（P. Aufschnaiter）、德国人哈雷（Harrer）在拉萨附近的辛多山嘴济曲（拉萨河支流）发掘古遗址与墓葬³等。正是通过上述各种方式，西方近代考古学开始传播到中国。

综上所述，在20世纪最初的五十年左右，西藏的考古工作几乎完全是由西方学者进行的。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局限，尽管他们取得了上述的诸多成绩，但毕竟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如同已有学者指出过的那样：“杜齐等人的工作，对于西藏考古学的建立具有积极的意义，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做法局限于对地上文物的随机调查与搜集，虽然网罗周遍，但门类庞杂，缺乏系统、深入的专业性研究”⁴。

作为一名具有科学精神的学者，杜齐在他的《西藏考古》一书引言中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首先要明确的是，如果我们把适当的、有指导的挖掘称为考古学的话，那么西藏考古是处于零的状态。……因此，目前我们仅能勾画出考古学方面可能的未来研究的远景，对于将要解决的问题给予关注，并从考古学及艺术史的角度来注意最令人感兴趣的遗址和地区”⁵。在此书的“结论”中，杜齐再次重申：“考古学及西藏艺术的整个历史并不是已确定了事实的一个部分，而是

1 G. N. Roerich. *The Animal Style Among the Nomad Tribes of Northern Tibet*. Prague: Seminarium Kodakovianum, 1930.

2 黎吉生：《吐蕃早期墓葬和公元8、9世纪的藏族装饰艺术》（*Early Burial Grounds in Tibet and Tibetan Decorative Art of the VIIIth and IXth Centuries*），载《中亚学报》（*Central Asiatic Journal*），第8卷，第73～92页。

3 P. 奥夫斯莱特：《西藏居民区史前遗址发掘报告》，杨元芳、陈宗祥译，《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

4 罗炤：《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读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1998年第7期。

5 G. 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未来的研究计划。……问题的进一步明朗化——我们期望这一明朗化不会拖延得太久——取决于我们对西藏考古下功夫的调查及对西藏文化发展的细致研究。如想解决如此明显而又颇为复杂的问题，显然需要我们广泛深入地了解亚洲的不同文化。如前所述，中国考古学家面临的迫在眉睫的任务是编纂一本详细目录，包括所有现存的、有关考古及艺术方面的资料。要确保资料可以记录和拍照，并承担起对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遗址的挖掘工作，特别是对墓地、王陵及雅砻和拉萨的周围地区”¹。杜齐虽然未能亲眼看到后来中国学者在这些地区获得的新发现，但他对于吐蕃考古所设想和规划的蓝图，却是极其富有远见的。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藏地考古进入一个划时代的新的发展时期。1959年西藏正式成立文物管理小组，这是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前身，也是西藏最早成立的文物管理机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者开始独立自主地承担起西藏考古工作的重任，陆续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这个阶段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藏考古学的初建时期。西藏考古进入它的旺盛发展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布置之下，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现已改名为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组织领导了西藏全境文物的普查工作，在先后几次较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了许多藏地的古遗址、古墓葬，科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较之前一阶段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藏地考古在前一发展阶段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持续发展，田野考古工作继续深入开展，工作区域也开始从原来吐蕃王国统治的中心区域向外扩展，在西藏西部和东部这些过去考古工作开展较少的地区，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

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藏地考古这一研究领域在国际藏学界有着长期形成的研究传统和悠久历史，以杜齐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与海外学术界相比较，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几乎处在空白阶段。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奋起直追，在西藏田野考古中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在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综合研究两个方面都在同步前进，基本改变了过去只是由外国人在西藏零星开展一些调查和发掘的格局，使藏地考古被纳入与我国其他省区总体规划、总体发展的科学

1 G. 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轨道,开始稳步向前发展。

正是在这样一个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和大背景之下,为了科学地推进藏地考古向前发展,适时地对既往的藏地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加以总结,对已经形成的田野考古报告和研究论著作一次系统地搜集、整理和集成出版就成为一项当务之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一项“史料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傅斯年曾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讲到:“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尔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¹这种重视史料,以“史料探史实”的科学态度,在今天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

藏地考古作为中国边疆考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拓宽了我国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研究领域,西藏考古也成为藏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与环境条件,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也被视为人类“生命的禁区”。究竟人类何时开始踏上西藏高原?他们又是如何在这里生存繁衍下来的?在进入历史时期之后,不同发展阶段藏地的文明形态有何特点?与中原和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关系如何?藏文化的特点是如何通过文物考古的实物资料得以体现的?这些涉及西藏高原人类开发、拓殖和生存、发展的历史,过去仅仅依赖极为有限的汉藏文献材料来加以探索,难免扑朔迷离,被厚重的神话与传说织成的帷幕所遮盖。用科学的史料和史实来重新揭开西藏历史的神秘面纱,从19世纪末叶以来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之一。而中国学者虽然参加到这个学术课题中来的时间要稍晚于西方学者,但却勇于奋起直追,后来居上。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学者在藏地考古这一研究领域中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所谓“天时”,是新的时代创造了新的条件和背景,我国学者能够顺应学术潮流的变化和发展及时地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所谓“地利”,是从地缘优势而言,我国学者不仅能够顺利地、在藏地开展科学研究,也便于将藏地考古的成果和周边地区加以比较,从而认识藏地文明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特点;所谓“人和”,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藏地文物考古工作得到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

1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

切关怀，汉藏两个民族和谐共处，汉藏两个民族的儿女组成的专业队伍在自己的土地上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田野工作。而这一切，都是西方学者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那么，中国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与西方学术界相比较还存在着哪些差距？我们的优势与不足何在？什么是今后努力的方向？通过《中国藏地考古》的编辑出版，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检阅，能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

最后我们还要试图阐明的一点是，从前文中所引证的傅斯年先生关于学术发展的三项标准出发，我们认为：未来藏地考古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是要用科学的地下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来重新“书写”历史。

从来的历史，都是人们记忆、回忆、书写、述说、争论的“过去”。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对“过去”都有不同的研究途径和“书写”方式，而且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我们如何突破自身所存在的表征体系限制而了解另一遥远时代、遥远地域和人群的表征世界？著名考古学家A. H. 丹尼和V. M. 马松曾经说到：“考古学再度拓展了人们对于世界史前史的知识，令迄今未为人知的许多古代文化和古文明中心得以公布于众。由此所导致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也有助于形成一种理论：将世界史视为普遍与特殊情况结合的一种复杂模式。一方面，广泛的类似性反映了全球的趋势，或者正在以巨大的地区性差异为背景对这种类似性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于特定地区和特定民族的研究正增添到世界文化的公共宝库中来”¹。本书所讨论的对象——中国西藏地区，也正是一个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研究范例。

诚然，考古学带给我们的遗存是客观而真实的，但同时它们又是零散而凌乱的，加以考古材料本身更多反映的是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物质文化的某些特征，而人类文化是由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至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构成，所以，要想复原和重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完整的文化史，仅仅依靠考古材料是不够的。例如，考古材料可以提供给我们不同人群的生前居住遗址、死后的墓葬，人骨材料，包括曾使用过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食物和艺术品种，但对于当时人们如何组织生产、缔结婚姻，如何从事宗教活动、如何组成复杂社会组织等，无论是考古材料中的遗址或者遗物，都不可能提供直接、具体、生动、完整的材料，唯一的途径，是必须将考古材料放置到“过去”的背景当中加以诠释，重新进行

1 A. H. 丹尼、V. M. 马松：《中亚文明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一卷“导言”，第1页。



“书写”。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所说：“关于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由于问题比较复杂，单独根据考古资料来解决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没有文字史料的原始社会的历史面貌，我们主要地依据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来了解它们”¹。这里，考古学和民族学都同时承担起对于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的“译码”工作，往往是由考古学揭示事物本体，将我们未知的一面加以揭露；而由民族学将已知的事实作为例证与之加以比较，引导我们从已知去推导未知，来解答考古材料如何构成现实本相，以及由此现实本相如何产生叙事、行为、事件、物象等情景，从而进行知识的探索，形成系统的书写表述。近数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分注意“文本”（text）与“情景”（context）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知识（knowledge）的路径，思考诸如社会与个人、结构与符号、本相与表征等二元对立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²，这些思考对于我们如何通过考古发现来书写西藏历史，也是具有深刻影响和启发意义的。

过去主要基于汉文历史文献书写的西藏上古史（也可视为藏文文字产生和吐蕃王朝兴起以前的“史前史”）的基本构架，是以“西羌”的迁徙作为基本线索展开的。根据《后汉书》的描述，作为三苗与无弋爱剑后裔的羌人，原来分布于青藏高原东缘，被称之为“西羌”，后来有些羌人部族如发羌、唐旄等迁往青藏高原内地，成为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群。唐宋以来的汉族史家认为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国的“吐蕃”，就是这些西迁的羌人部落融合而成的。如《新唐书》就在《后汉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记载吐蕃出于“发羌”，因“蕃”、“发”两字声近，故其子孙称为“吐蕃”³。而在藏族本民族关于民族起源的传说中，最为广泛流行和最为著名的则是“猕猴与罗刹女结合变人说”，认为藏族的来源最早是居住在今天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一带的雅砻地区，以山洞为居穴，众猴不断繁衍演化为人类，以吃野谷穿树叶为生，后来发展成为藏族的先民。但与此同时还有印度释迦王后裔说、三苗说、马来半岛人说、缅甸说、蒙古人说、伊朗血统说、土著与氐羌融合说等各种传说⁴，其基本架构与汉文文献记载一样，都认为藏族是外来民族，藏族的祖先是来自西藏高原以外的地方迁徙而来的，可以统称为“藏族外来说”。而王明珂则将这种历史叙事与书写模式

1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

2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1页。

3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上》。

4 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9~41页。



形象化的概括为“英雄徙边记”¹。

基于考古学的文本书写从一开始便会与这种历史叙事和文本书写模式分道扬镳，因为后者的基本前提是否定远古西藏有人类居住，尽管所谓“猕猴与罗刹女结合变人说”表面上似乎与古猿之一演化为人类的科学学说也有相似之处，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偶然巧合，其本质仍是原始氏族图腾崇拜的一种反映而已。而基于考古学的西藏史前史则根据考古发现从根基上否定了“藏族外来说”，认为早在距今数万年前，青藏高原已有早期人类出现了，而且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活动遗迹、石器工具、居住遗址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些先民们在踏上这片高原之后所经历过的发展进程，西藏的史前史由此展开和形成。

基于考古学的文本书写自然也会尽可能地会从历史文献、历史记忆与传说、当代民族学与民族志资料当中吸取其合理的部分，与考古材料进行类比，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归纳和发掘可能更接近于历史本原的“事实”，但其根基却始终会坚实而牢固地建立在考古材料本身。如前所述，考古材料有其零散、凌乱的局限性，加之不同的学者对于同一文本及其内在符号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但是经过认真的整合研究之后形成的文本，绝不会是由一堆散乱无章的符号构成，而自会有其结构性规范。

由于藏地考古开始较晚，资料的积累与整理工作要远远落后于中原和其他各省区，要朝着上述这个宏远的目标努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是，只要我们目标明确、路径正确，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所以，《中国藏地考古》的编辑出版，如同在前进道路上竖立起一个路标，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起到这样的引领作用。这也是我们编辑本书的期望与预期达到的目的，愿与识人方家共勉。

1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年，第77~79页。